

金融业开放的重点领域与风险防范

□ 陈建奇

核心阅读

中国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促进全球资本的高效配置，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但中国金融开放也伴随着金融重大风险的防范问题，必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中国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金融监管规则与国际对接，强化金融监管标准和程序的透明，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深化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目标。

中国金融开放的三大重点领域

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国都注重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通过金融开放促进资本等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以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着力完善市场机制，稳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商业银行、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为主体的市场体系，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金融业务越来越普遍，中国金融机构也积极走出去从事国际金融业务。但截至目前，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比仍然较低，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金融开放仍有较大空间，重点体现下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外资持股比例、业务牌照发放等。较长时间以来外资行与外资券商的持股比例分别限制在20%及49%，外资券商与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业务牌照的监管也较为严格，大部分中外合资券商只有投行业务的牌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此后金融开放举措不断出台，上海自贸区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商投资股比限制等问题逐步消除，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大幅度提升，内外资有望逐步得到同等待遇。与此同时，金融开放应该是对等的开放，中国金融加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应要求其其他国家同步对我开放金融市场，为中资金融机构进入世界其他国家市场奠定基础。

二是资本跨境流动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指标，也是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国通过沪港通、深港通、RQFII及QDII等方式促进国内外资金市场的部分连通，还通过人民币贸易结算等方式促进人民币的跨境流动，香港等离岸金融市场积累了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人民币存款，这些都是中国资本跨境流动机制不断完善的重要体现。未来需要重点推进的是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改革，这种方式既保证不同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保障资本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切

实推动资本跨境双向流动机制的建立。

三是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开放有待进一步探索。互联网金融是当代典型的新兴金融业态，但区块链等关键基础设施尚未构建，互联网金融交易具有隐蔽性、不可追溯等崭新特点，世界尚未形成互联网金融金融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中国互联网金融如何与其他国家开放对接等问题尚未有经验可循。但互联网跨境金融交易已经日趋普遍，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发展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新的交易模式，互联网金融不断扩张的趋势难以逆转，如何探索互联网金融开放，构成了中国未来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

中国金融开放风险的三大表现

金融开放是把双刃剑，虽然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但也面临着金融安全的问题。世界上金融较为开放的国家出现金融风险上升甚至金融危机的现象并不鲜见，金融风险的升级是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特定的国情才能深入分析潜在风险。结合中国实际来看，当前中国金融开放既有转轨经济环境下的金融重大风险，也有国际形势变化背景下新的金融重大风险。

首先，金融市场开放引发金融机构倒闭风险。开放意味着竞争的加剧，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企业可能面临着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到近年来才基本完成，汇率市场化进程仍未结束，利率及汇率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导致中国国内金融机构转型的滞后，商业银行改变以存贷差为基础的经营模式的动力不强，基于利率及汇率等金融创新产品还不丰富。相比国外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市场多元化盈利能力较低的问题突出，金融开放带来外资金融机构的较快进入，激烈竞争可能引发的国内金融机构倒闭等风险不容忽视。

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风险。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将伴随着做空做多等投机资金跨境流

动风险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为代表的投机资金持续对泰国等国家货币进行做空，资金跨境大规模进出引发市场利率及汇率大幅波动，政府由于缺乏外汇储备等干预手段而出现了货币危机的问题。虽然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应对潜在的汇率市场波动，但中国巨大的金融体量决定了短期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也可能非常巨大。2014年以来中国汇率机制改革伴随着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警示未来资本账户如果可自由兑换，那么投机资金跨境流动所可能引发的汇率大幅贬值或者货币危机的风险将不容低估。

再次，互联网金融业态滋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相比其他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引发的风险更加隐蔽。即便一个国家不开放互联网金融业务，市场也可能由于互联网的联通而出现非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相关业务的问题，这就相当于国内外金融市场通过互联网而实现了联通。一方面，国内相关互联网金融业务可能由于游离于监管之外而面临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国外互联网金融或者其他金融风险的爆发，可能沿着互联网的链条传到国内，促使国内同步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

消除金融开放恐惧症，稳步推动金融开放改革

虽然金融开放可能伴随着金融风险升级，但不意味着金融市场不要开放。相反的，通过开放有助于深化本国金融与外部市场的合作，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中国金融体系能实现从计划模式逐步向市场模式转变，显然与40多年的对外开放具有内在联系。美国等金融强国都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金融体系支撑，体现了金融开放对于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未来要消除金融开放恐惧症，强化金融监管是重要举措。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

机构的有效链接，通过激活居民在消费中积累的非现金类优惠资源，借助合理的金融工具跨期投资，形成“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有益补充，从而引导居民适度降低预防性储蓄比例、平滑释放消费能力、有效满足潜在消费需求，推动实现“消费创造价值、积累保障未来”的互促共进。二是构建供需匹配的互动服务机制。加快建立全面反映居民综合消费规模和结构的指标体系，完善指标发布机制，支持企业充分挖掘和应用商业大数据分析顾客需求和消费行为，建立及时、高效的消费需求反馈机制，做精做深做优消费体验。三是构建邻里互助的社区消费场景。优化调整社区商业街、无人便利店等设施布局，支持培育社区商业新品牌，营造“智慧便捷、邻里互助”的社区消费氛围。实施“服务到家”计划，整合社区服务网点资源，打造宜进入、可参与、能共享的邻里中心，就近引入养老、家政、文化、健身等服务机构，构建大都市15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

聚力完善协调联动的城乡消费格局。加快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带动促

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方面，在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问题上，要坚持先改革后开放的顺序，由此降低金融开放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如果金融先开放后改革，促使离岸金融市场化运行与在岸金融行政管制同时并存，那么可能引发套利套汇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促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贬值压力，有评论倡导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中国被动积累外汇储备问题。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将倒逼资本账户可兑换，同时，资本自由流动将倒逼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否则行政管制的利率、汇率容易造成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紊乱。利率、汇率及资本账户在内的改革涉及金融核心领域，必须制定稳健的改革路线图，谨防金融风险上升。结合理论来看，先推行利率汇率的金融改革以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的转型升级，然后再开放金融市场，有助于降低金融改革所滋生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机制建设上，要强化基础设施及金融相关人员的管理机制建设。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员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要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

总体来看，金融开放既涉及国内金融体制机制建设，也关乎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对接，既涉及外部资本的流入，也关系本国资本对外投资。中国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促进全球资本的高效配置，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但中国金融开放也伴随着金融重大风险的防范问题，必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升中国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金融监管规则与国际对接，强化金融监管标准和程序的透明，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深化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目标。



进农村产业转型和农民增收，真正让消费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缩小城乡消费差距。鼓励开展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性创新，推进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试点，促进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鼓励农村居民“市民化”，逐步实现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彻底解决进城人员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二是推进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平衡城乡消费供给水平。鼓励开发适应农村消费趋势的产品和服务，引导发展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汽车等消费，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深度挖掘农村生态资源，叠加休闲观光、健康养老等功能，形成农村市场新的消费热点。三是深入开展消费扶贫，促进城市反哺农村消费。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鼓励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地区产品，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堵点，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融入全国大市场。

聚力培育绿色健康的现代消费理念。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简约

（上接1版二条）要经常性地交流重点干部，对长期在一个领域、一个部门、一个岗位担任要职的干部进行轮岗，促使干部汲取新知识、激发新热情。

注重一线成才。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一线工作法，以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征地拆迁、脱贫攻坚等为重点，把更多精力放到工作一线，把更多政策和资源向一线倾斜，积极投身改革发展主战场、攻坚克难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以工地为阵地，以现场为考场，始终坚持视使命为生命、凭发展论英雄、以项目比能力、从担当看品格，让一线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平台、干事创业的平台。

提高综合能力，练就过硬本领

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必须不断提升综合能力，淬炼真才实干，使自己的思维视野、能力素养紧跟时代步伐、担负起历史使命。

增强善于学习的本领。面对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学习本领作为第一位的本领和提升能力的基本保障，将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工作习惯，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特别要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敢于扬弃旧思路、老观念，主动研究新特点、新规律，积极谋划新思路、新方法，铸就开创新工作新局面的强大内在动力。

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要主动作为去抓落实，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领导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干就干到最好、做就做到极致、走就走在前列。要攻克克难抓落实，以“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和“争当出头鸟”的胆识，以钉钉子精神把纸上写的、口头讲的、会上部署的东西落实落细，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要久久为功抓落实，提升“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一棒接着一棒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步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心前移，全面提升应对各类风险的感知力、预判力、把控力，知风化险、防微虑远，科学应对重大风险矛盾，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提高识别风险能力，科学预见发展趋势、洞见风险挑战，使风险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防患于未然。要提高应对风险能力，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现代技术手

段，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化险为夷、变危为机。要提髙管控风险能力，善于运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正确选用有效的预案和办法，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战。

营造干事环境，激发创业热情

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党员领导干部既需要加强自身修炼，也需要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引导党员领导干部面对难题敢闯敢试，处理矛盾敢抓敢管，迎战风险敢作敢为。

为担当者遮风挡雨。干事创业总是有风险的，不能期望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党员领导干部要善于打造一个遮风挡雨、共担风险的宽松环境和干事氛围，使之挺直腰杆、甩开膀子、迈开步子，全身心投入到干事创业中去。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牢牢把握“三个区分开来”，全面建立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体制机制，在体制机制改革、征地拆迁、重大事件处理中科学界定符合容错免责减责条件的具体情形，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党员领导干部放开手脚干事，一心一意成事。

为实干者加油鼓劲。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让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干部脱颖而出，绝不让老实人吃亏，形成“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守初心、担使命、有作为的干部开启始终奋斗、永运奋斗、不懈奋斗的“最美绿色通道”。

为失误者指航引路。容错与纠错是建立激励干事创业机制的“一体两翼”。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好谈话函询纠错止错的独特作用，对苗头问题早发现早提醒，对失误差误早纠正早补救，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汲取教训、改进提高。注重把握谈话函询的“尺度”，进一步明晰使用情形，严格工作程序，增强谈话函询的严肃性、规范性。始终保持谈话函询的“力度”，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线索处置、抽查核实，相关结果与干部使用、考评相结合，增强谈话函询的威慑力。着力提升谈话函询的“温度”，推进了解反馈常态化、形态转化常态化、通报澄清常态化，构建谈话函询了解情况反馈长效机制，消除想干事却担心犯错误被问责的顾虑，让党员领导干部吃下“定心丸”。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

（上接1版头条）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社会的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社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消费供给创新、消费感知提升、消费格局营造、消费理念引导、消费环境优化等方面率先突破，构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消费型社会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全面增强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活力，筑牢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回旋空间。

聚力构建创新驱动的消费供给模式。围绕居民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培育新消费、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形成以消费结构优化引领经济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一是鼓励发展新技术新模式。以“互联网+”和智慧城市建设为导向，

加快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汽车、服务机器人等消费产品，创新发展网络消费、定制消费、智能消费等业态。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消费金融、健康金融、教育金融等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助推消费热点培育和消费模式变革。二是推动传统消费转型升级。支持传统消费企业创新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积极引入有吸引力、有触发性的新消费新体验，发展自有品牌，实行深度联营，向全渠道平台商、集成服务商、供应链服务商、定制化服务商等转型。三是创新公共服

务供给方式。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拓宽公共服务多元化融资渠道，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管理，根据人口结构、消费习惯等精准匹配公共服务内容，促进供给与需求同步迭代、联动提升。

聚力提升共建共享的消费政策制度。加快构建激发当期消费、增强长远保障的良性互动机制，有效保护居民消费意愿、满足消费需求、优化消费体验。一是构建多方互利的消费年金制度。探索构建商户、居民、金融

适度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进可持续消费。一是筑牢绿色消费理念。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科普活动周、全国低碳日、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居民更多选择生态服装、节能家电、绿色住宅、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二是传承理性消费文化。大力宣传倡导坚守本真、勤俭互助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引导居民培养简约适度、雅俗兼容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意识，形成全社会健康、理性消费的良好氛围。三是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识体系、认证评估体系，完善绿色产品追溯制度，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绿色产业健康发展。前瞻性研究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稳妥合理提高税率。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绿色产业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聚力营造开放包容的消费市场环境。加快打造高能级国际消费空间载体，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和权益保护机制，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消费环境。一是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加快布局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支持举办国际性消费展会活动，探索建立主要消费品国际价格监测比价机制和合理定价体系，适度发展市区免税店、口岸免税店，打造一批全球知名的城市消费品牌和世界级地标性商圈。二是逐步放宽消费领域市场准入。鼓励各类资本进入文化、教育、养老、育幼、医疗、家政等服务消费领域，有序开放经营权限，逐步取消外商投资股比等限制条件。坚持以审慎包容的态度推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加快制定完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规章制度，引导消费经济有序合规发展。三是加快提升消费信用管理水平。探索以商务信用为核心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形成以商务信用数据交互为基础，政府与市场主体多维互动、网络化协同的新型应用机制。加快构建“事前告知承诺、事中评估分类、事后联动奖惩”的全过程信用管理体系，加快培育信用经济，积极发展与信用相关的新型服务业。

（作者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